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身份变迁论析

张明霞

(外交学院 基础教学部 北京 100037)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变化,农民身份发生四次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形式是:翻身农民、国家农民、社会农民和新型农民。每一种身份都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相联系,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政策的变化发展。

[关键词]农民;身份;政策

[中图分类号] D4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8487(2012)010-0088-05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身份:翻身农民

翻身农民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出现的,其主要标志有两个:其一,土地改革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其二,政治地位的提高,农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毛泽东的“农民三性说”一定程度上说出了农民的身份。1958年12月,毛泽东为《张鲁传》印发作了很长的批语,指出“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1] (P142)} 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特殊的阶层,集封建的小生产性、资本主义的民主性、原始的社会主义性于一体。这种身份特征是需要通过政治教育来改变的,也极大地影响着这一时期农民的身份特征。主要表现是:

1. 这种身份主体是被动分化、组合形成的利益主体。

身份状态的形成和利益密切相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农民处于社会底层,对土地的渴望和对翻身的祈愿是他们多年的梦想。但是,由于自身的弱点,他们又难以独立革命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角色。而中国农民人口众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多次尝试之后,也开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但是,那时在广大农村还存在不同的阶级成分,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使农民成为利益一致的主体。在农村划分阶级,主要目的是发动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划阶级就是分清敌、我、友。因此严格地按照政策正确地划分每个农户的阶级成分,对所有的村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情。”^{[2] (P8)} 由此引申出了一个个与上层建筑一致的阶级。这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有着很大的差别,从阶级自觉上讲,以往的农民起义都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境界。不过,每一次农民革命都不是出于自觉的精神

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起义,也是通过革命的理论引导的。“在划阶级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贫雇农的阶级觉悟并与地主、富农划清界限,从一开始就强调要通过斗争来取得胜利,一再强调要防止‘和平土改’。所以划分阶级最后是以斗地主来完成的。”^{[2] (P9)} 其形式比较激烈,在一些地方火药味很浓。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被动的分化和组合的因素,是一种被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翻身农民的政治热情高涨,尽管政治选举形式比较简单,但是场面很感人。不少农民兴高采烈,像过节一样参加选举,他们心情也随着身份的变化而变化。这个时候,让我们真正体会到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选举是劳动人民的节日。但是,这种被动状态的延续形成负面影响是明显的。“作为利益主体,农民再次被动地分化重组,其性质不是农民怎样从他所属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中剥离出来,而是如何由革命主体和主要依靠力量转为建设主体,并且进入一个从属于他们的组织结构中去,这个组织结构就是经由集体化而形成的人民公社。”^{[3] (P133)} 而当我们将城乡区别看待时,后来演化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所包含的权利不平等,变成了很严重的历史问题。

这一时期农民身份的划分还与阶级斗争有关系。尽管同在一片土地上耕作,在土地改革中就有了地主、富农、贫农等阶级成分,而且在贫民和地主之间,有意突出了不共戴天的思想意识。解放后,尽管地主、富农也种地,也开始自食其力,也在思想上被改造,但是出于专政的需要,这些人的身份中多了一些标记。1950年8月20日,按照政务院公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农村居民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政治身份。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三代贫农是根正苗红,谁穷谁光荣。这种认识后来又

[收稿日期] 2012-06-20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非制度化生存的负面效应及其治理模式研究”(10BZZ001)。

[作者简介] 张明霞(1981-),女,黑龙江双鸭山人,外交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强化了农民的身份特征。农民本来应该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专业的人,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却成了一种特定的身份。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共仿效苏联模式,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推进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的制度性因素就已经出现。应该说,这一时期,党的动机是好的,没有故意歧视农民的行为,但在当时的国内国外形势下以为暂时牺牲农民的当前利益而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动机,是值得商榷的。

2. 这种身份状态是被动教育下形成的文化状态。

建国初期,农民的革命热情很高,其积极性不能否认。但是,由于农民自身存在的如落后性、封闭性和狭隘性等缺陷并没有随着革命的洗礼和农民的翻身而被消除,当然它也不会自动地消失。因此,我认为,建国后严重的问题就是教育农民。这样一来,一方面农民仍是革命的主体之一,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思想也要被革命。这种状况注定要和农民的身份变迁联系在一起,而且其身份变迁优势是在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生成、变化和发展的,不可避免地和中国的社会化、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1951年7月,针对当时农村出现的农民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及乡村干部的松气现象,《新湖南报》发起了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这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场讨论是建国后第一次对农民自私、狭隘思想的批评运动,也是第一次对农民及乡村干部进行的思想教育活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发起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既借鉴了革命时期根据地民众教育的经验,又承袭了苏联的成人教育体制。通过加强组织管理和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内容和形式,中国农村扫盲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农民的身份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

3. 这种身份状态是户籍制度下的被动束缚状态。

用现在的眼光看,户籍制度形成是有悖宪法精神的。1952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指出,近来有不少地区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下达了“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这是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1954年3月12日,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发布“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实际上,当时流入城市的农民还不多,并未造成严重问题,因此政府只是“劝止”,并没有过激的行动。1956年底,形势发生了变化。从1956年底到1957年底,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连续发布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文件,言辞越来越激烈。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只有当人与住址相结合,在户口登记机关履行登记后,法律意义上的“户”才成立;户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公民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户口,一个公民在同一时间只能登记一个常住户口;公民在常住地市、县范围以外的地方暂住3日以上,须申报暂住登记;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必须在迁出前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注销户口;不按条例规定申报户口或假报户口者须负法律责任。“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行,

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正是这一规定,使户籍成了农民身份的主要特征,也使广大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利受到损害,对农民乃至全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户籍制度成了各行政部门限制或控制个人迁徙和居住自由的法律依据,也是固定农民身份的依据。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民身份:国家农民

国家农民是翻身农民的延续,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民身份状态。只是国家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身份特征更加突出,并得以固定和格式化,并以其巨大的惯性延续下来,影响至深。土地是国家的,财产大多是国家的,甚至连个人都是国家的。一切行为、一切活动,都打上国家和集体的烙印,私人空间狭窄、思想活动畸变。国家农民的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国际因素,在阶层观念上,有明显的工、农、商、学、兵之分;在区域观念上,城乡差别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而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在经济行为上,不能有私字,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斗私批修,私人买卖是资本主义尾巴,是必须割掉的。户口成了区分城市市民和农村村民的身份标志,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身份成了终身身份和世袭身份。本来社会进步应该逐步消灭家族制度,呈现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但是中国社会中以固定农民的身份来确定最大的社会群体的定位,明显地保留着落后保守的痕迹。尤其是文革时代,贫农身份意味着出身优越,而地主富农等身份的人是专政的对象,当兵要接受身份的考验,上学要接受身份的考验,甚至“不良身份”会祸及三代,给不少人心灵留下隐痛。这一时期,对农民身份的固定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可忽视。而且,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负面影响一直延伸着,至今仍有子遗。

国家农民的身份特征,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

1. 明显的政治色彩。

人民公社制度的出现,使农民身份定格在国家农民的形式上。这是一个“政治挂帅”时代,一切活动都要在政治的天平上考量。这也是毛泽东的乡村理想在农村的实践,其特征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在这个体系中,经常性地突出阶级斗争,对农村的地、富、反、坏、右实行经常性的专政和劳动改造,每当政治运动到来时,他们就会成为批斗的对象。尽管经过土地改革,地主和富农作为阶级已被消灭,但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这两个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即地主、富农分子该怎么对待?不少人的理解是,既然当初把地主和富农定位成敌人,那么现在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也应该是敌人。在近30年的时间里,地主、富农被作为专政对象,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极大的歧视。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甚至也不能享受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血统论广泛存在。在农村,贫农出身的人有一种自豪感,而地主富农出身的人则有一种自卑感。稍有不慎,人身可能会受到攻击,心理会遭到摧残,一些地方的批斗会花样翻新,与我们党倡导的保护人权政策严重背离。这样一来,不仅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工人等有了身份差别,在农村,不同出身成分的人又构成了阶层上的身份差别。十年文革又把身份的政治性质推向顶峰,个人的社会

行为、公共活动等都要打上身份和阶级成分的印记。

2. 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农民身份上的计划经济色彩是在农民身份固定的前提下形成的。在1952年到1958年间,“户籍管理”、“用工制度”、“粮食统购统销”、“交通制度”以及以户籍为必要条件的“福利制度”陆续形成,这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基础。有了这些制度,城市招工有了身份限制,高校招生有了身份限制,福利享受有了身份限制,商品买卖有了身份限制,农民的社会流动有了身份限制。用工制度、招生制度等和与生俱来的“阶级标签”集合在一起,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农村,农民阶级这种先赋性的“政治身份”长期被限制在“一大二公”的生产体制内。人民公社制度和统购统销保证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和城市的生活保障,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对农村的集体公益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这种体制将农民整齐划一地以一种身份特征表现出来,削弱了农民作为利益主体行使权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农村长期的贫穷和权利畸形成为这一时期农民生活的基本状况。

计划经济色彩在农民身份上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生产和生活都和指标联系在一起。农村的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粮食、副食、工业原料。我国农村以土地国家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为主,也要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指令性的农产品统购计划和相应的生产计划,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由集体管理,农民对土地仅有使用权。生产多少、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都要按照国家指令来进行。凭票购买商品是当时的特有景观,这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出于战略考虑采取赶超型发展战略,对城市工业和重工业发展投入较大,加上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物质资源远远不能满足生活和生产需要,采用了“抽农补工”的做法,试图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这种投资和资源配置等优先保证城市和重工业发展的理念和做法,造成了城市对农村的挤压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抑制,也使农村的生活用品严重不足。

计划经济色彩在农民身份上还有一个表现,就是限制农产品自由买卖。1965年1月,全国财贸工作座谈会上重新提出“加强对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个体商贩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反对他们的投机倒把活动和资本主义经营作风”。会上明确规定了“七个不准”,即:不准经营批发业务,不准超过规定的经营范围,不准超过规定的活动地区,不准任意增加网点,不准任意增加人员,不准违犯国家的价格政策,不准随便在集市上和到外地采购。同年9月,商业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小商小贩社会主义改造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对小商小贩的管理教育,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严格控制人数,随着人员老化,逐渐自然淘汰,以便形成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一些地方采取了过激的行为。如:197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一文。随后,一些地方相继效仿,取消自由市场和集市贸易。山西省运城、临汾地区组织大批干部和民兵到集贸市场撵人,驱赶甚至扣押赶集群众,强行没收交易商品。安徽省萧县提出所谓“商业革命”,派出由人民武装部、公安局及民兵指挥部的武装人员,联合起来围剿集贸市场,禁止农民养鸡养羊,派出工作

队到社员的自留地拔菜、砍树,甚至没收自留地。这样的情况下,农民经商无门,只能“安心”维持自己的身份,“安居其业”。

3. 明显的封闭特征。

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民,在国家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政策的影响下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从事着“糊口水平的家庭农作”,其政治心理脱不开“小农意识”。“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4] (P678)} 列宁也认为“由于没有无产阶级这个领导者,农民非常闭塞、消极、愚昧、对政治漠不关心。”^{[5] (P129)} 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民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一是经济发展上的封闭。那时候,由于国内环境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经济决策,我们主要是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实现农业发展的。农业发展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工业给予农业的援助很少,国家的财政支持也很少。二是农民自身的封闭。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国家的农村政策和户籍制度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传统的小农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生活在基于传统的血缘关系、家族关系的环境中,熟人社会是他们全部人际关系的基础。三是活动区域上的封闭。有一段时期,农民到城市去是需要三级证明的。住店、吃饭、买车票等,先要被甄别一下身份,看看是不是流窜犯。此外,由于农民中普遍存在着民主意识淡薄的现象,他们对权力顶礼膜拜,甘心接受自己的身份状态,委曲求全,其心态也在他们的利益表达和政治行为中表现出来。

4. 苏联农业模式影响下的身份特征。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和列宁《论合作制》等,都非常明确地论述了这个问题。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方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但是由于当时缺乏经验,加上操之过急,侵犯了农民的利益。但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样板。在我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由于国际国内原因,我们也借鉴了苏联模式。而且,中国革命的道路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血肉关系。出于强调革命的不停顿性,在引导农民走向更高的组织形式的过程中,没有完全冷静地审视当时的发展状态,而是把苏联的做法当做样板加以仿效,不可避免地带有苏联农业模式的特征。

5. 与低下的生产效率相联系。

一是在当时全国农业发展水平是比较低的,主要是靠手工劳动进行生产,缺少大规模经营的生产基础,不得不将经营的单位缩小到家庭或个人,其生产水平可想而知。二是原来那种大规模经营下的集体耕作对每个人的劳动数量、质量很难准确统计,导致“大锅饭”现象严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劳动的积极性。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平均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按劳分

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6] (P48)} 三是农民的责任心下降,这是平均主义造成的恶果。表面上看,财产是国家和集体的,人人都有份,实际上看,却是人人没有权利。因此,“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7] (P157)}。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农民身份:社会农民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巨大变革。人们的思想认识在变化,行为方式在变化,社会地位在变化。这一切,都给农民的身份带来巨大影响。农村“两个飞跃”对于农民身份变迁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生产经营上,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在粮食支配上,“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这种自主性给农民的心理意识带来了生机,促使他们尝试在过去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情。随之而来的经营自由、思想活跃都是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下生成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农民不仅有了在本地选择工作的机会,也能够走出家门或走出大山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去体验生活的变迁。尽管在工厂或企业里,他们还是农民,但他们身上开始有了个人的感觉,从“农民工”这个词的字面不难看出。社会农民的身份有以下主要的特征:

1. 与改革开放相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身份特征开始从单一性走向多样化,从“政治身份”走向“多个行业阶层”。限制社会流动的门槛被拆除或降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有可能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并向非农产业转移。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国家对农村工商业的解禁也随之消失,尤其是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支持,成为“农民非农化”的重要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被“就地消化”,或转移到外乡,这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农民身份的变迁。同时,农村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基层民主制度的实施,改变了农民的参与方式,政治活动不再是以前思想批判和阶级斗争等过度的政治化方式。农民从政治性的身份转入市场性的“职业”区分。农村开始出现阶层分化,一个农民可以同时拥有几种职业身份。不过,在改革开放初期,“农民这种阶层开放性和多重性,使农民各个阶层对自己暂时所处的阶层没有太多的归属感,阶层意识薄弱,这就削弱了各个阶层的凝聚力,弱化了个人对阶层和阶层冲突的参与程度。”^{[8] (P32)}。在国家的“户籍制度”下,“中国在城乡之间还游离着一个数量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他们脱离农村在城镇生活工作,却因为其农村户籍和农民身份,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9] (P92)} 农民身份变迁过程的地位问题,依然是一个现实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

2. 与社会转型相联系。

中国社会转型中,不少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正在改变。在富裕观上,现在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发展才是硬道理,观念已有天壤之别。在发展观上,以前强调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斗争哲学”,现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讲和谐,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共建和谐世界”。从“斗争”到“和谐”,又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社会建设上,以前提“要大公无私”,“要斗私批修”,要“狠斗私字一闪念”。现在提倡“以人为本”、“促进民生”,“生产”和“生活”的顺序改变了。社会转型中,农民的身份也在变化,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外出务工的农民身份的界定。有人称之为“农民工”,尽管还带有某些歧视的含义,毕竟改变了农民原有的纯而又纯的身份形式。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农民工大规模地涌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为缩小城乡差距做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还在现行社会结构中,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遭遇不平等的身份带来的不平等待遇。整体上看,农民身份的变化仍然是进步与缺陷共存,农民工的公民身份还不完整。

社会转型最明显的标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这对农民的权利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市场经济崇尚自由和公平,“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交换,才能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并作为在交换中这种相互等价的证明者,才是价值相等的人。”^{[10] (P196)}。恩格斯认为“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所有者,他们作为商品所有者来说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11] (P446)} 市场经济以尊重主体的自由、平等权利为前提,尊重公民的财产权,合理关注利益成为正确的价值导向。这对多年来不敢公开言利的农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精神鼓舞,他们不再把谋取个人利益看成禁区,而是以极大的热情去拥抱利益,这也使原来单纯的农民身份中注入商业成分。

3. 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联系。

社会农民身份状态又是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联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别于合作化前的个体经济,其前提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所有权仍归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相对分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标明了利益关系,责任明确,利益直接,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决定了: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经营有了很大的自主性,比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经营自主权明显增多;另一方面,农民还在一定程度上和土地密切联系,土地仍然是他们生存的主要保障。这两个方面作用的结果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同以往相比有了很大变化,而经营自主权的变化是明显的,但是,这种权利仍然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改革初期,农民的身份处在国家农民向社会农民的过渡和转型时期,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身份痕迹。这个时期,集体经济组织是双层经营的主体,是农村经济体制的主要表现形式,承包家庭经营是双层经营的基础,缺少任何一方,就会背离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意,双层经营体制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没有集体经济组织,就谈不上“统”,没有家庭的分散经营,也谈不上“分”,农民是在“统”“分”结合中发挥作用的,农民的身份特征是在“统”“分”结合中体现出来的。不过,这个时候,虽然农村生产力得到很大的解放,但是,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对农民索取太多,农村发展的后劲还不够,农村经济的飞跃还不能很快实现。所以,这一时期的农民身份是和农村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联系在一起的。

4. 仍然与一定程度的权利缺位相联系。

这一时期,农民的地位有了很大改观。但是,从这个时

期的法律法规看,还存在着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现象。关于人大代表的选举权,1995年修订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第16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按照这一规定,四个农民的权利才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2004年修改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保留这些内容。关于结社权,中国有《工会法》却没有《农会法》,进城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也无权进入工会。关于基本劳动权,1994年的《劳动法》对从事农业的农民却没有涉及。他们在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等方面都受到歧视,而且基本没有社会保险,劳动成果经常被剥夺,拖欠工资现象屡见不鲜。关于社会保障权,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基础制定的,该条例不适用于农民。1996年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没有将农民和城市市民同等看待。医疗方面的保障成本更大。而在受教育权,在教育资源的享受、教育机会的获得等方面还有存在较大差别。

四、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民身份: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是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界定的,也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定位的,饱含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1. 新型农民与新农村建设相联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这一决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and 创造性,对农民转变观念,确立新的身份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既表现为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特征,又表现为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平等占有社会资源的能力,还表现为与其他阶层一道共享所创造成果的制度安排。这需要通过发挥农民在推动自身富裕和农村现代化中的强烈进取心来实现,需要通过发挥农民为创造财富而渴求现代科技、不断改造自己的革新精神来实现,需要通过发挥农民自主性、自觉性来实现。拥有真正的主体性,是新型农民与国家农民的重要区别。国家农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处于依附和依赖的地位,其经济活动由国家和集体来组织,农民的自主性、主动性、开放性和创造性都受到很多限制。新型农民又是社会农民的进一步延伸,体现了农民的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地位。农民既是财富的创造者,又是财富的共享者。而且,农民的身份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这可以从现有的政策中体现出来,如“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减免两税、三项补贴、四项基本保障”措施、免费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等。党和政府制订的政策和措施,逐步消除了不平等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农民的合理有序流动成为不争的事实。新型农民在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自身贫困状况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农民的创造性得到发挥,农民的自信心得到加强。这种精神面貌是以往所没有的。

2. 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联系。

社会和谐离不开农村和谐,而农民是实现农村和谐的主体。在经济上,农民是推动经济繁荣、生产发展的主要动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通过战略性调整不断优化和升级,都需要有农民的积极参与。在政治上,农民是推动管理民主、村

民自治的力量,落实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都需要有农民的积极参与,目前的村务公开制度、民事民议、民财民理,都是农民的创举。在社会建设上,农民是推动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力量,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都离不开农民的广泛参与。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综合素质的提高,也需要以农民为主体来施行,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推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要依靠农民。可以说,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没有广大农民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目标将难以实现;没有广大农民素质的全面提高,新农村建设的速度、质量和效益都将会受到极大影响,也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局面。

3. 与以人为本理念相联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的身份又是和以人为本密切联系的。可以说,没有科学发展观的引领,就没有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就没有新农村建设的人本情怀,也就没有对农民地位的重新认识。没有以人为本,就没有一系列保障农民权益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农民的权益保障有了更牢靠的基础。不过,从长远看,政府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在践行“以人为本”过程中,还要赋予农民更多的国民待遇,更合法的财产权利,更合理的发展机会。通过践行以人为本,解决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农村劳动就业改革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问题,让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待遇,城乡劳动力自由流通权利,让农民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包容性增长,要使更多的农民能够享受到这种发展的成果。这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一思想的贯彻和落实,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身份特征也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参考文献:

- [1]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
- [2]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3]孙津.中国农民问题及其政治特性[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6).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8]陆学艺.改革中的农村和农民[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9]吴晓林.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的分化与政治整合研究[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2).
-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 刘绛华